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

——以毗沙门天王和城隍神为中心

王 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

——以毗沙门天王和城隍神为中心

王 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以毗沙门天王和城隍神为中心 / 王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161 - 1666 - 1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神—信仰—研究—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53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琪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24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言	(1)
一 选题缘起与概念界定	(1)
二 论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4)
三 史料讨论与研究方法	(10)
 第一章 中国古代城市保护神兴起、发展的条件与基础	(13)
第一节 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唐宋时期的发展	(13)
一 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初期发展	(13)
二 唐宋时期城市的发展概况	(16)
第二节 中国古代城市居民的构成与唐宋时期市民阶层的 形成	(19)
一 中国古代城市居民的构成	(19)
二 唐宋时期市民阶层的兴起、形成	(20)
第三节 唐宋时期佛教对城市民众的深刻影响	(24)
一 唐宋时期佛教对城市民众的直接影响	(25)
二 唐宋时期佛教对城市民众的间接影响	(29)
三 唐宋时期城市民众的佛教信仰意识	(31)
 第二章 中国古代城市保护神的兴起与初期发展	(33)
第一节 中国古代城市保护神的兴起	(33)
一 有关城隍神起源的探讨	(33)
二 毗沙门天王的源起	(40)
第二节 中国古代城市保护神的初期发展	(43)
一 唐宋以前城隍神信仰的发展	(43)

2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

二	唐宋以前毗沙门天王信仰在中土的传播	(48)
第三章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二元格局的形成	(57)
第一节	毗沙门天王的加入	(57)
第二节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信仰的普遍化	(64)
一	城隍神信仰的普遍化	(64)
二	毗沙门天王信仰的普遍化	(72)
第三节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84)
一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盛行的原因	(84)
二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盛行的影响	(91)
第四章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在区域分布上的差异性	(95)
第一节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在地理分布上的区域性特征	(95)
一	写经题记	(103)
二	发愿文	(104)
三	榜文、贴文	(106)
第二节	城市保护神在区域分布上的差异性所昭示的南北城市文化的不同	(109)
第三节	从城市保护神的发展演化看唐宋时期中外文化、南北城市文化的融合	(119)
一	从毗沙门天王流变看唐代中外文化交流	(119)
二	从毗沙门天王与城隍神的交融看唐宋时期南北城市文化的融合	(122)
第四节	从城市保护神的发展演化看唐宋时期思想文化的演变	(126)
第五章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神性与职能的发展演变	(130)
第一节	城市保护神神性的发展演变	(130)
一	城市保护神神性的人格化特征浓厚	(130)
二	城市保护神神性的正统化特征明朗	(149)
第二节	城市保护神职能的扩大化	(166)
一	毗沙门天王职能的扩大化	(166)

二 城隍神职能的扩大化	(174)
三 城市保护神神性与职能的演变性质	(187)
四 唐宋以后城市保护神的发展分化	(189)
 第六章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与宗教的关系	(204)
第一节 毗沙门天王对佛教的游离与部分回归	(204)
第二节 城隍神向道教的靠拢	(209)
 结语	(221)
 主要参考文献	(226)
 后记	(240)

绪 言

一 选题缘起与概念界定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曾经引起过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①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民间信仰因被单纯地戴上了迷信的帽子，在学术界销声匿迹。

直到 20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深入，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作为民间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信仰开始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他们开始尝试解读民间信仰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从而使民间信仰成为全面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普通百姓的一个独特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代表性的著作有乌丙安的《中国民间信仰》^②、金泽的《中国民间信仰》^③等。

但这些研究成果，在时间段上，主要集中在明清及其以后。而事实上，由于民间信仰具有很强的传承性，深入地了解明清以前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间信仰，不仅是打开古代社会的一扇窗户，更可探索近现代民间信仰的源流。因此，对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深入探究就显得比较迫切了。

处于唐宋时期的中国古代社会，正是一个城市大量兴起、城市民众大量增加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城市民众主要由中小工商业者、下层贫民、未及第的读书人或落魄文人以及浮客、艺人、奴婢等社会阶层构成，虽然其人数众多、成分复杂，但由于他们处于共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有着共同的

①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98 年版；费孝通：《江村经济》，《费孝通文集》第 2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柳诒徵：《述社》，载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许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41 年版；张亮采编著：《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 1911 年版；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 1935 年版。

②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金泽：《中国民间信仰》，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2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

生活空间，因而也就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思想信仰，这些信仰既和上层正统文化关系密切，又和宗教纠缠在一起，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状。因此，对城市民众信仰的研究便构成了解这一时期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的一把钥匙。而在城市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对城市保护神的景仰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一神灵深入地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以城市保护神为契机来探索城市民众的思想信仰，可以起到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效果。

此外，对唐宋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还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发生在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因为民间信仰不是单纯地存在、孤立地发展的，它和社会现实胶着在一起，互相影响，所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唐宋时期，在政治、经济及社会诸领域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士族的衰落与平民的崛起、君主权力的强化、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包括田制的演变、赋税制度的演变、货币制度的变革）、城市的大量增加、市民文化的形成，等等。政治、经济领域的这些变化对当时人们思想信仰的影响是必然的。这些影响在下层民众当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们所信仰的众多神灵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此消彼长，相互转化。而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的发展历程很清楚地显示出了由于社会变化而带来的民众对神灵信仰的演变轨迹。因此，对这一神灵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唐宋时期变化着的社会现实。

再者，一个时代的城市文化往往是这一时代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风向标，对城市民众思想信仰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入了解整个时代的思想信仰状况，因此，以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为研究对象也就显得很有意义了。

本书以“唐宋时期的城市保护神”为研究对象，在时间段上，以唐代中期至两宋为重心，部分论段上溯至史前文明、下探到元明清时期，为的是尽可能在比较宽的时间段里分析论证，以得出较客观的结论，也便于进一步突出重点段。

就“城市保护神”而言，它的作用本是护佑城市及其城中的居民，使其免受伤害。但由于中国民众是多神崇拜的，他们对任何一位神灵的景仰基本上都是出于直接的现实生活诉求，而并非出于希冀终极的幸福，因此，几乎城市民众信仰的每一位神灵都具备使他们免受伤害这一功能。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5页。

在本论题中，仅就城隍神和毗沙门天王进行专门论述，其他神灵的这一功能暂且搁置。

书中在论述城市保护神的性质时，曾多次提到其是“民间信仰”的一种。中国的民间信仰，从古代的自然崇拜、庶物崇拜、灵魂崇拜等原始宗教到后来的道教和通俗佛教等都包括在内，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些宗教和思想累积混合以后，就构成了巨大的民间信仰体系。^①这一体系的主要信仰人群是社会的下层，即广大的民众。运用这一概念进行研究的成果有很多。^②有关下层民众的信仰，学界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如“民间宗教”^③。任继愈先生也指出：“所谓民间宗教，是指不为统治阶级所承认，不允许公开传教，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宗教，因而又称为民间秘密宗教。”^④祁泰履（Terry F. Kleeman）则把“民间宗教”定义为“各种职业各种阶层的人在私生活里所奉行的宗教”，“民间宗教是永远不绝的信仰主流，因为涉及日常生活里的利益和安全，所以非常巩固”^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将民众的信仰和国家的祭祀结合起来，而不应该完全将其对立，因为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孤立存在、分层运作的，而往往是上下交融在一起，相互影响的。^⑥还有提法如“民生宗教”^⑦，就这一概念其作者指出：“不是仅仅考察民众有什么样的信仰，而是这些信仰如何作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考察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的信仰在国家政治、地域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赵世瑜先生则指出：

① 参见姜义镇《台湾的民间信仰》，武陵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如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国民间信仰的功能与模式》，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王晓丽《中国民间的生育信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贾二强《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汤一介主编《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北京国际宗教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176页；李富华《中国民间宗教史》，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等。

④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6页。

⑤ 祁泰履：《由祭祀看中国宗教的分类》，载李丰楙、朱荣贵主编《仪式、庙会与社区：道教、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548、549页。

⑥ 雷闻：《书评：〈唐宋民间信仰〉》，载《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527页。

⑦ 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

4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

所谓民间宗教,指的是不被官方认可的、由民众组织和参与的宗教体系和组织,它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自己的教义,在思想内容上与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有一定的联系,可是往往被官方视为危险的邪教和异端。而所谓民间信仰,则指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包括围绕这些信仰而建立的各种仪式活动。它们往往没有组织系统、教义和特定的戒律,既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这一定义基本上将“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进行了区分,但又指出了二者的联系所在,较为中允、客观。

本书在吸收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仍采用“民间信仰”这一概念。具体而言,就城市保护神的信仰群体,不管是在人员数量上还是在信仰程度上,都以城市下层民众为主,但并不排除城市上层人士,所指并不进行严格的社会分层,他们共同构成城市保护神信仰的主体。就信仰的客体——城市保护神而言,也并不单纯地将其划分到神仙鬼怪这一行列,事实上,它与国家正统思想、正统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样是一个受各种因素影响的混合体。

二 论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在对众多民间神祇的研究中,城隍神是颇受学者重视的一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邓嗣禹先生就发表了《城隍考》一文^②,该文可谓近代学人在此方面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作者从城隍神信仰的起源、变迁和释道二教间的关系以及崇祀城隍的用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城隍神信仰的发展过程,这为后世城隍神信仰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路。

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③主要是探讨了城隍神的起源问题,文中运用史料、推理考证的方法,第一次提出城隍神起源于祝融。郑土有、王贤森的《中国城隍信仰》^④是一部探讨城隍神信仰较为完备的著

①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页。

② 邓嗣禹:《城隍考》,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935年第2期。

③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④ 郑土有、王贤森:《中国城隍信仰》,三联书店1994年版。

作。在该书中，作者将城隍神信仰的性质、特点、职能、来历、类型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之后，将城隍神信仰的历史轨迹：从其起源到最后的衰微进行了梳理；接着，对城隍庙、庙会进行了动态的分析；最后，对城隍神信仰在中国信仰体系中的地位和流行的原因进行了反思，指出城隍神信仰是一种已逝去的宗教文化。该书史料详实、论证严密，但文中大量的篇幅是在叙述明清时期城隍神信仰的发展状况，史料也以明清时期为多。贾二强的《唐宋民间信仰》^①对城隍神职权的演变作了较细致的分析，史料全面，指出城隍神的职能由原来的护城保民发展到无所不能。郝铁川的《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②从城隍神的由来、职掌，以及它与道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郑土有、刘巧林的《护城兴市——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③，从城隍神的职能、城隍庙的兴起以及城隍信仰与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城市经济、市民道德体系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余欣的《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之《城隍》^④，主要就敦煌地区的城隍信仰进行了梳理，指出这一地区也存在着对这一神灵的信仰。

张泽洪的《城隍神及其信仰》^⑤分四个部分来叙述城隍神信仰：一为城隍神信仰的起源，认为其起源于水塘神，之后演变为人鬼；二为城隍神的职掌，指出从其产生到明清时期，其职掌呈扩大化的趋势；三为城隍神信仰与民俗，主要论述明清庙会对城市民众生活的影响；四为城隍神信仰与道教，指出迟至南宋，城隍神已被纳入道教的门下。此文在时间段上起自城隍神信仰的产生，下到清朝，比较概括地论述了城隍神信仰的产生、职能及其与民众生活和宗教的关系。颜亚玉的《城隍祭起源与城隍原型探析》^⑥主要通过史料考证和推理的方法来论述城隍神原型，得出的结论是：城隍神即祝融，这一观点回应了丁山先生的提法，同时也论证了城隍神始于水塘神的不可靠性。公维章的《唐宋间敦煌的城隍与毗沙门天王》^⑦，对敦煌地区的城隍神信仰进行了梳理，指出敦煌也有城隍神信仰，

① 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③ 郑土有、刘巧林：《护城兴市——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⑤ 张泽洪：《城隍神及其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

⑥ 颜亚玉：《城隍祭起源与城隍原型探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⑦ 公维章：《唐宋间敦煌的城隍与毗沙门天王》，《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2期。

6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

但并不兴盛，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毗沙门天王比较兴盛，从而导致城隍神信仰相对衰落。郑土有的《共生互荣：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关系研究》^①，主要从城市经济与城隍神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入手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是促使城隍神信仰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颀、宋永志的《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②，从宋代尤其是南宋的社会现实出发，指出城隍神被赐额封爵主要是由当时的战乱所致。赵轶峰的《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③一文中针对滨岛敦俊先生的文章中关于明初洪武三年改制中所谓朝廷内部“惯习派”和“理念派”的定义提出质疑，认为滨岛先生的有关研究忽略了明太祖本人在明初宗教政策中的决定性地位，其以两元对立观念考察儒、道关系，忽略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契合的一面，并根据明中叶以后情形推测明初情形，加以对史料处理简率，因而造成一系列误解，并指出朝廷内部所谓的两派对立是子虚乌有的事。张传勇的《明清山东城隍庙“异例”考》^④和《省城隍庙考》^⑤对省城隍庙出现的时间及省城隍庙在清代的变迁作了阐述。而他的《试论城隍庙的建造依据》^⑥，则指出城隍神信仰在唐宋时期的发展与这一时期官僚政治体系的成熟有关。

雷闻的《隋唐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关系研究》^⑦，将城隍神信仰置于唐代地方与国家祭祀体系中整体考虑，指出城隍神的性质判定是由地方官灵活掌握的，工商业的发展只是促使城隍神兴盛的原因之一。

对城隍神信仰的研究，国外学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

那波利贞的《支那に于ける都市のに就きて》^⑧，此文注意到了敦煌文献中有关城隍资料的重要性，但又认为敦煌没有城隍神信仰。此外，文中将城隍一概解释为都市或城内的居民。湊德忠的《中国宗教における

① 郑土有：《共生互荣：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关系研究》，《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② 王颀、宋永志：《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③ 赵轶峰：《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求是学刊》2006年第1期。

④ 张传勇：《明清山东城隍庙“异例”考》，《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⑤ 张传勇：《省城隍庙考》，《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张传勇：《试论城隍庙的建造依据》，《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⑦ 雷闻：《隋唐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2年。

⑧ [日] 那波利贞：《支那に于ける都市のに就きて》，《支那学》第7卷第4号，1935年。

受容・变容・行容——道教を軸として》^① 论述了城隍庙的建造过程，大体说来，城隍庙始建于三国时期，南北朝至唐，城隍庙逐渐增多，到宋以后，分布范围更为广泛，明代以后，府州县的层级制度化体系确立，到清代，这一过程最后完成。小岛毅的《城隍庙制度の确立》^② 集中论述了城隍庙宇从兴起到确立的过程，指出城隍神的信众为工商业者的说法只是其诸多面向中的一种而已。中村哲夫的《城隍信仰からみに旧中国のと国家と社会》^③，滨岛敦俊的《明初城隍考》^④、《明清江南城隍考》^⑤、《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考》^⑥ 等主要是论述了明清时期城隍神的发展概括。

美国学者戴维·约翰逊的《中国唐宋时期的城市神灵信仰》一书^⑦，先运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城隍神主，之后，指出唐宋时期城隍神兴盛局面的出现和这一时期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成果涵盖了城隍神的起源、职能、发展以及明清时期的辉煌和式微。但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明清时期这一神灵的研究上，而对于早期的城隍神研究又主要是集中在对这一神灵的来源和发展方面的探究上，有关唐宋时期城隍神的整体面貌与发展演变具体情况的研究显得不够深入明了。此外，关于它与社会、民众以及与国家政府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显得较为薄弱。本书拟从唐宋时期城隍神的发展变迁以及它与当时社会、民众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进行探究，以期进一步深入揭示这一神灵在唐宋时期的真实面貌。当然，上述已有成果对于本书的研究无疑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书认为，唐宋时期的城市保护神，并不仅仅只有城隍神这一枝独

① [日] 洼德忠：《中国宗教における受容・变容・行容——道教を軸として》，山川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日] 小岛毅：《城隍庙制度の确立》，《思想》第 792 号，1990 年。

③ [日] 中村哲夫：《城隍信仰からみに旧中国のと国家と社会》，载《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法律文化社 1984 年版。

④ [日] 滨岛敦俊：《明初城隍考》，载《夏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汲古书院 1988 年版。

⑤ [日]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载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 VI 集《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刀水书房 1988 年版。

⑥ [日]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考》，载《中国の都市と农村》，汲古书院 1994 年版。

⑦ David Johnson, "The City - 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5, NO. 2, 1985.

秀,外来的毗沙门天王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中来,形成了二元并存的新型格局。以往学界对毗沙门天王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单纯的佛教神灵或者是中国古代的战神来论述的。在这方面已经涌现出许多成果,主要有:徐梵澄的《关于毗沙门天王等事》^①,文中对毗沙门及其子的音译作了考证,并进一步指出,西域等地的毗沙门天王造像已经不是印度本土的毗沙门天王形象,而是经过了西域的本土改造。柳存仁的《毗沙门天王父子与中国小说之关系》^②,以《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为例,论述了李靖天王的由来、木叉与金吒以及哪吒等故事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将文学与史学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之《西北战事与毗沙门天王信仰》^③,指出唐时毗沙门天王的盛行直接受这一时期西北战争的影响,而毗沙门天王也因此被人们崇拜为战神。正因为如此,有关毗沙门天王的经文、经籍等都是在中土编造而成的。郑阿财的《〈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与敦煌地区的毗沙门信仰》^④,将敦煌地区的毗沙门天王感应事迹一一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这些灵验事迹集中反映了敦煌民众对毗沙门天王信仰的兴盛状况。张先堂的《唐宋时期敦煌天王堂寺、天王堂考》^⑤,从敦煌地区的石窟进行考证,得出北方毗沙门天王具有独特的护法性质。严耀中的《汉传密教》之《护国与护教——毗沙门天王崇拜述论》^⑥,叙述了毗沙门天王在佛教中地位突出的原因、唐代毗沙门兴盛的表现以及宋元以后的演变及其影响等。杨宝玉的《敦煌文书〈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校考》^⑦,主要就敦煌文书中的这一记载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得出敦煌地区毗沙门天王兴盛与当时社会现实关系密切。张国刚的《佛学与隋唐社会》之《毗沙门天王信仰》^⑧,叙述了中唐以后毗沙门天王作为战神和俗神的功能以及民众对它的景仰情况。李小荣的《敦煌文献论稿》之

① 徐梵澄:《关于毗沙门天王等事》,《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② 柳存仁:《毗沙门天王父子与中国小说之关系》,载《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 郑阿财:《〈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与敦煌地区的毗沙门信仰》,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⑤ 张先堂:《唐宋时期敦煌天王堂寺、天王堂考》,载《二十一世纪敦煌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中自然文化学会1999年版。

⑥ 严耀中:《汉传密教》,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⑦ 杨宝玉:《敦煌文书〈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校考》,《文献》2000年第2期。

⑧ 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毗沙门信仰》^①，通过对《毗沙门天王经》等诸密典、在敦煌发现的毗沙门伏经及相关文献的简析，通过对敦煌的毗沙门画像和《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的分析，来揭示敦煌地区毗沙门天王信仰兴盛的状况。夏广兴的《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之《唐代的毗沙门天王信仰》^②，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毗沙门天王在唐时的流传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也进一步表明佛教的中国化对文学的深入影响。党燕妮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在敦煌的流传》^③，集中就敦煌地区的毗沙门天王崇拜情况进行深入探讨，揭示出毗沙门天王在敦煌是很盛行的。古正美的《于阗与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④，从毗沙门天王的渊源入手，探讨了敦煌地区毗沙门天王的信仰情形。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石窟、造像等方面对毗沙门天王进行研究，主要的成果有：贺世哲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⑤、宁强的《巴中南龕第93号毗沙门天王造像龕新探》^⑥、黎方银的《毗沙门天王像》^⑦、胡文和的《毗沙门天王》^⑧、李淦的《略论中国早期天王图象及其西方来源》^⑨等，这些成果进一步补充了文献资料，使对毗沙门天王信仰的研究更加深入。

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松本文三郎的《兜跋毗沙门考》^⑩指出兜跋毗沙门在日本广为流传，其原型无疑来自中国，但中国很少使用“兜跋”一词，西域发现的天王像与日本的兜跋像很相似，此词应来源于中国西藏。宫崎市定的《毗沙门天王信仰的东传》^⑪，指出毗沙门天王渐渐地在这四天王中的地位脱颖而出，并受到独立祭祀，进而东传。台信佑

① 李小荣：《敦煌文献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党燕妮：《毗沙门天王信仰在敦煌的流传》，《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

④ 古正美：《于阗与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载《2000年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⑤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⑥ 宁强：《巴中南龕第93号毗沙门天王造像龕新探》，《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

⑦ 黎方银：《毗沙门天王像》，载《大足石窟艺术》，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⑧ 胡文和：《毗沙门天王》，载《四川道教、佛教石窟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 李淦：《略论中国早期天王图象及其西方来源》，载《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⑩ [日]松本文三郎：《兜跋毗沙门考》，《东方学报》1939年第1期。

⑪ [日]宫崎市定：《毗沙门天王信仰的东传》，载《纪元2600周年纪念史学论文集》，1941年版。

尔的《敦煌の四天王像》^①、田边胜美的《毗沙门像の诞生》^②，从实物塑像的角度分析了毗沙门天王的流传情况。贝克的《隋唐早期墓葬中的天王像》^③从隋唐早期墓葬中的天王像入手来说明毗沙门天王的信仰状况。

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毗沙门天王进行了研究，但也可以看出，研究者主要是将这一神灵作为战争保护神或单纯的佛教神灵来研究和讨论的，在有些成果中，虽也隐隐约约提到了它的保护性功能，但并未明确指出。显然，这并不足以涵盖毗沙门天王在中土流行时的所有功能，事实上，它对城市的保护作用在唐宋时期是非常突出的，将其作为城市保护神来解读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揭示它对中土民众的影响以及它自身的发展演化规律。

三 史料讨论与研究方法

正史是用以研究的基本史料。正史记载虽然以政治事件为主，但由于政治事件大多涉及一个朝代的思想、宗教等相关内容，因而一些篇目如《封禅书》、《郊祀志》、《五行志》、《方术传》、《方伎传》以及一些人物的列传也是来源之一。

政书、类书如《通典》、《大唐六典》、《唐会要》、《宋会要辑稿》以及《太平预览》、《册府元龟》等，可以提供相关的官方信息以及政策制度，可以对论题的内容有一个正确的把握。

诗文集中有不少篇章涉及城市民众的信仰、娱乐及其生活方式。本书主要采用宋李昉所编的《文苑英华》，清人所辑的《全唐诗》、《全唐文》等。

碑刻、造像题记、愿文也是来源之一。碑刻是唐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昶的《金石萃编》等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分相关的资料。此外，造像题记是民众心声的真实吐露，在资料搜集中，也将一些题记纳入，以求对唐宋民众祈神求佛愿望有尽可能全面的感性认识。王重民所编的《敦煌愿文集》中，有各类丰富的祈愿文，代表平民百姓的小传统，也是

① [日] 台信佑尔：《敦煌の四天王像》，载《东京国立博物馆纪要》，1991年第27号。

② [日] 田边胜美：《毗沙门像の诞生》，吉川弘文馆1999年版。

③ J. Baker, "Sui and Tang Early Period Images of the Heavenly King in Tombs and Temples", *Orientalism*, April 1999.

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

笔记小说是本书在论述中大量引用的资料。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书的资料范围中，包括唐五代至宋的各类传奇小说、笔记小说、野史笔记等，在引述时，不再就其门类进行严格区分，而是以笔记小说指称上述各门类的小说作品。这些材料的性质有较大的差异。那些专门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志怪小说作品，看似虚妄，但对创作者来说，他们都坚信自己所记的鬼神事迹是真实确凿的。而那些荒诞无稽的巫术奇迹、奇妙的神人交通、入冥传闻，对伪造者、传播者、信仰者而言，其中的信仰心态却是真实的。因此，从本书的研究目的出发，则是以揣测当时人们的信仰心态出发而信其有，即以一种“自伪窥真”的视角来看待。当然，笔者在处理笔记小说资料时，对其阅读和使用都是非常仔细的，力图审慎地运用笔记小说资料，得出较为允当的结论。对以信仰为基础铺陈内容的作品和以展现史笔诗才为目的的作品要区别对待，充分考虑到作者的创作背景，尽量避免使所用资料的价值都体现在单一的层面上。

由于涉及敦煌地区的信仰，因此，敦煌藏经洞文献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前人所做的录文；另一类是前人未做过录文的文书原卷或其影印件。在对以往已有研究的材料作出新的诠释的同时，仍将努力发掘新史料。藏经洞出土文物，如绢画、纸书，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石窟建筑、碑刻等，也应纳入我们的视野。

佛、道藏中的文献、史传部分，在搜集资料时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从方法论上讲，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要运用各种学科的方法，但本书主要以历史学和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的研究，虽然和思想、宗教密切相关，但落脚点在于“史”。因此，这个论题的研究主要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而历史学是以追求历史真实为目的的，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

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再把这个目的分段细细解释，必定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说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能说到活动。^①

①（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2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页。